

平台基础设施、数字主权与新地缘政治

——一项基于抖音和 TikTok 的研究

刘 洁 刘战伟

摘要:互联网平台的基础设施化,使其成为超越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全球公共品与公共事业,却难免数据主权与安全方面的国别纠纷,导致新型地缘政治冲突。本文以抖音和 TikTok 的并行平台化为案例蓝本,聚焦中国、美国、印度与欧盟等全球主要数字平台创新与应用地区,分析其引发的并行平台化与基础设施化、数字主权与日常数据安全、网络空间的新地缘政治冲突三大主题。中国平台的逆向扩散使其站在了地缘政治冲突的最前沿。新地缘政治与传统地缘问题相互交融影响,“数据民族主义”使“互联网”走向基于主权国家的“局域网”;而平台尽管在某些层面具备了超国家权力,却被视为“政治闯入”的角色,成为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筹码与各方的争夺之物;美国对中国的多轮制裁,则具有“数字冷战”的色彩,投射出对平台企业成为“政治代理人”的忧惧与阴霾。可见,民族国家始终是全球竞争的核心主体,并主导着平台政治的秩序,TikTok 面临的困境是中国平台全球化挑战的缩影。但是,零和博弈的观念只会增加全球结构性风险和集体脆弱性,冲突的反面亦存在广阔的合作可能。

关键词:互联网平台;地缘政治;基础设施;数字主权;平台政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5)02-0097-12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 2022 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22RXW18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4CXW014)

一、问题的提出

平台扩散出现在不同领域,导致社会场域特定制度化实践发生重塑,关键经济与生活部门都在经历“平台化”(platformization)转变,逐渐获得“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的属性。^[1]基础设施建设本是国家主导的权力,平台却凭借强大的资本、经济与数据优势获得了部分管辖权的扩张。在这样的语境下,大国竞争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即地缘政治力量的主要来源开始从工业时代的工业技术主导转变为信息时代的信息技术主导。^[2]当前平台社会由两大系统主导,一方是以 Facebook(2021 年更名为 Meta,后统一为 Meta)为代表的五大美国互联网平台,另一方是以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五大中国互联网平台。从支付宝社会信用系统的高速发展、滴滴打车的数据化策略以及微信中不断增加的第三方接口来看,全球见证了中国互联网平台基础设施化的极快过程。中国庞大且不断发展的超级平台被视作对美国实力构成了挑战,数字平台已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新战场。

地缘政治在数字空间愈演愈烈,短视频平台作为全球数字主权争夺与地缘政治操纵的焦点,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对抗的场域。欧盟希望获得对国际科技公司的更多控制,并在数字领域实现更大独立性;印度 2020 年禁止了 59 款中国应用程序;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2020 年要求将 TikTok 出售给美国公司;2023 年 3 月,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首次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并接受质询,并一直持续发

醉至今。美国认为,TikTok的崛起与全球扩张对美国在数字领域的技术霸权和传媒霸权构成威胁,严重侵害美国公民隐私权利,损害美国国家安全,让美国感到巨大的竞争与威胁。^[3]在中美平台基础设施冲突中,从来没有一个平台像抖音和TikTok如此特殊,发端于中国本土,逆向扩散进入西方主流国家,制造出全球罕见的“并行平台化”现象,成为平台研究的焦点蓝本。

抖音和TikTok是能够完善平台与基础设施概念框架、拓宽平台研究视野独一无二的案例。它们同属一家公司字节跳动(ByteDance),共享相似的功能设定、交互设计与核心技术,却从同一源头流入两个截然不同的市场,即严格控制的中国市场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在具有鲜明对比的政治与技术背景中划分为两个平行宇宙运行。本文旨在依托全球数字地缘冲突主要国家的公开法律和政策文本,就数字空间的新型平台地缘政治展开反思。具体而言,抖音和TikTok的并行平台化与基础设施化何以成为持续“政治骚动”的一部分?数字主权与数据安全如何成为新型地缘政治冲突的最前沿,反映出哪些地缘政治的新问题与新特征?从而进一步理解其背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技术民族主义与技术合作主义、数字主权争夺与地缘政治矛盾等逻辑。

二、文献回顾

(一) 嵌入社会系统:平台基础设施化与平台治理

跨学科的平台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起步,Helmond将“平台化”概念化为“社交网络的主要基础设施和经济模式及其后果”。^[4]随着平台研究跨学科属性的增强,基础设施概念被引入平台研究。Nieborg将“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定义为数字平台的网络和应用生态系统扩展渗透到社会经济、政府和基础设施中。^[5]其本质是纵向将平台的技术体系与生产规制渗透至其他创新主体。这一研究脉络主张将平台化进程置于具体语境下,考察其如何渗透进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部门,形成混合平台社会。

而平台基础设施化也需要面对四个核心困境,即与基础设施连接的第三方需要面对自我资源配置、基于监管的保障、多样性资源配置和主权保障。^[6]目前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均在质询如何监管这些问题。一些学者呼吁考虑平台扮演的角色及其监管与治理框架,要求政府和其他监管机构干预新兴平台社会^[7],就像国家在物理基础设施中所做的一样,并回应平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作为公用事业监管,以构建问责平台^[8]。

特定的历史与当地环境是平台基础设施化的焦点。“平台”一词是一种精巧的话语装置,掩盖了其背后的权力结构^[9],而平台化从来不是一个中立的过程,更无法独立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有学者认为,尽管微信案例和“中国模式”的广泛监管背景为平台实践提供了一些答案,但“中国模式”不应沦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平台资本主义,更不应是对数字媒体的彻底威权控制。^[10]中国视频娱乐平台的基础设施化离不开平台生态系统复杂的权力关系^[11],而抖音和TikTok却在平台化进程中对国内外有截然不同的文化与政策治理框架^[12],需要从“平台政治”的维度对平台基础设施进行系统化调查。

互联网平台的基础设施化,让平台在实质主义层面内涵公共性的权力属性,具备了“国家能力”的本质,成为主权国家的代理人,被主权国家征用,成为国际合作、博弈与冲突的前沿阵地。字节跳动下属的TikTok不仅仅是一个娱乐资讯平台,而是变得“基础设施化”,成为主权国家经济运行、民主政治、文化生产等公共生活的基底性系统。此时,无限渗透的平台基础设施,成为超越主权国家领土物理边界的新物种,被迫卷入无法置身之外的数据主权、国家安全等摩擦与冲突中,引发主权国家间基于平台生成的新型地缘政治冲突。

(二) 二元平台生态系统:地缘政治下的逆向扩散

作为全球互联网的发源地,美国诞生了大量的互联网平台企业,Google、Meta、Amazon、Twitter(2023年更名为X,后统一用X)、Uber等均是全球社会耳熟能详的跨国平台,成为美国全球扩张的

商业代理人,欧洲、东南亚、中东、南美随处可见美国平台企业。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互联网平台快速崛起,成为全球唯一能够挑战美国平台霸权的力量,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等平台巨头纷纷布局出海,不过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大多局限于东南亚、东亚等国家,无法触及北美与欧洲等美国平台的大本营。然而,TikTok、Shein、Temu等中国垂直平台异军突起,直接闯入欧美平台的大本营,尤其在美国本土的扩张迅猛,直接冲击了美国平台巨头的业务,重塑了全球平台竞争格局。这种新的变动与趋势被称为中国互联网的“逆向扩散”。技术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引发了基于地理空间的传统地缘政治秩序的剧烈变动。

全球大型互联网公司主导的信息传播新型基础设施正在市场、政治和文化等层面重组全球信息流动与地缘政治新秩序。平台已调整了他们的发展目标,发表了建设“社会基础设施”的声明。TikTok的发展起源于一种“平台全球主义”的势能。^[13]Meta以免费阅读和社交的原则阐明其企业运营,旨在建立一个安全、参与和包容的社区。^[14]阿里巴巴打算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一个电子世界贸易平台,进而实现“包容性全球化”。^[15]GAFAM平台的主导地位维持了美国文化标准的全球化,此类标准通过平台政策实施,但如何对其进行解释和执行是不透明的,常引起争议。^[16]平台基础设施化的全球推进与平台政治自带的矛盾关系持续影响着国际地缘政治格局。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主要是研究大国强权政治与其地理因素之间关系的学科,“强调地理对政治的影响”。^[17]而网络空间崛起解除了传统地理空间限制,地缘政治力量开始由信息技术主导。网络空间的地缘政治属性一方面来源于网络空间组成架构的地缘属性,互联网活动看似是个人的,却镶嵌在一系列物质基础架构、逻辑秩序以及法规制度中;另一方面来源于网络空间活动主体的地缘属性,网络空间设施运行者、使用者、管理者、得益者都是基于被物理区隔的现实地缘政治空间。^[18]主权国家正在交替审查或部署互联网平台,以维护国家数字主权与安全。随着中国平台全球化进程加速,如何避免地缘政治二元主义、方法论民族主义和技术东方主义至关重要。

正确理解支撑TikTok政治行动和言论的逻辑需要将其置于地缘政治背景中。TikTok在参与逆向扩散过程中就面临着复杂而多元的风险,面对政府规制跨国企业产生的外来者劣势,TikTok主要采取否认型和支撑型沟通策略^[19];价值观上的“去政治化”和文化的“在地化”适应亦是其逆向扩散的重要政策^[20]。中国特定的平台化表现出强烈的技术民族主义特性。既有研究较少将平台基础设施化置于具体环境与语境分析,也较少从平台政治的角度考察其与政府及背后的权力和地缘政治问题。抖音和TikTok逆向扩散与困境折射出数字平台全球化中的共性问题,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本研究目标是通过将中国案例作为一种方法,批判性地观察、质询和补充当前平台基础设施的全球崛起。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由个案上升到公共议题,在对抖音和TikTok相关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的同时,收集了大量与抖音和TikTok相关的新闻报道、行业报告、法律法规与政府文件,尤其是中、美、欧盟、印度等主要国家和组织发布的与平台治理、数据安全、互联网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文件与协议条例,对收集资料进行仔细研读,从中提取核心话题,展开分析讨论。

其中,相关法案条例包含中国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和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美国是涉及的核心国家之一,包括2022年《威慑美国技术对手法案》和《限制危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威胁出现法案》、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案》、1996年《通信规范法》、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及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等。本案例亦涉及印度部分法律规制,主要有2009年《信息技术(阻止公众访问信息的程序和保障措施)规则》及印度政府新闻信息局电子与信息技术部的相关政策等。此外,欧盟亦试图通过严苛的法律维护自身

数字主权,包含2022年《数字市场法》、2018年《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四、并行平台化下的新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关注国家之间的空间和资源分配对国际政治的塑造。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基础设施逐渐成为超越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全球公共品,而随之产生的大量数据往往关涉国家数字主权与安全,导致数字主权的国别纠纷与地缘政治争端日益突出。

(一) 并行平台化:数字基础设施与公共事业

自20世纪7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经济使国家试图通过市场竞争降低成本、提供普遍服务功能的“现代基础设施理想”建设开始崩溃。^[21]在互联网技术驱动下,数字平台被赋予基础设施的想象,以降低成本、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全球分散的用户利用数字中介平台所搭建的基础设施,交换其未充分利用的资产、提供服务并分享技能。平台日益成为政府、市场创新者和用户的交汇点,乃至与国家相提并论的行为主体。基础设施开始按照平台逻辑重组,其提供的基础设施应用服务,包括社交网络服务、搜索引擎、应用商店、广告系统、零售网络、支付系统、身份识别服务和视听平台等,囊括了社会生活大部分基础功能。^[22]

信息传递的中介物不再是一种中空的管道,媒介作为一种制度化要素开始独立作用于社会变革,切实影响社会形构,甚至被一些国家视作一项“数字公共事业”。平台作为智能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者与运营者,正在局部取代政府。过去提及基础设施力量时人们常联想到的港口、公路、水资源系统或城市管理,如今这些曾由国家和政府所支撑的日常生活领域被不断扩张的平台部分接管,许诺为全社会提供安全的“公共品”与公共服务,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数字公共事业。平台正试图以“平台=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的术语掩盖其商业本质,以吸引更多利益相关方。

抖音和TikTok分别成为中国境内和全球性的基础设施。抖音通过其不断变化的技术架构为公共部门服务,“抖音之城”的流量效应在地方政府城市传播与经济锦标赛竞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地方政府间新的竞争点。可以说,政府与抖音之间并非单纯的监督关系,更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这赋予了抖音包容、开放的政治合法性,政府扮演着“监管者”和“支持者”的双重角色。抖音的基础设施化不仅来源于平台资本市场的积累,更依托于政府的包容与推动。海外版TikTok同样以势如破竹的速度爆红全球。二者全面渗透公众生活、公共交往与社会秩序,是地区经济、文化乃至政治赖以高效运行的数字基础设施。

根据最新报告,TikTok的用户数量为20.5亿,活跃用户为15.6亿,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23]随着X活跃用户的流失以及青年人对短视频的青睐,TikTok成为影响美国大选政治、商业模式与新闻分发的核心平台。尽管抖音和TikTok均隶属字节跳动公司,但是其在中西方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截然不同的制度市场、异质性的中西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对立冲突的政治制度与监管权力系统。在此过程中,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平台,也迥异于美国的各大平台,抖音与TikTok进化出两套几乎完全独立的管理系统,呈现出“并行平台化”的特征。

但当平台的基础设施化进程与政府深度纠缠在一起,并受制于国家权力,就构成了数字地缘政治冲突的诱因,亦是中国技术平台被指责具有技术民族主义倾向的根源。抖音“出海”的意义不仅是在全球寻求新的增长点,还在于改变既有的信息与地缘政治秩序。过去GAFAM难以全面打入中国短视频市场,Meta、Instagram和Snapchat曾推出的“视频故事”功能均身先朝露,努力融入国际市场的BAT也举步维艰。字节跳动作为一家新兴科技公司却席卷全球短视频市场,意味着中国互联网平台的逆向扩散。其对国际信息流的控制已然改变了经典的由美国主导的传统地缘政治格局,不仅威胁到美国公司的商业利益,还威胁到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TikTok的全球崛起与扩张承担着中国“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国家理想^[24],在后来的中美平台之争中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包容性支持,可以说,平台基础设施在地理上仍限于民族国家领土。主权国家越来越多地寻求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控

制,数字主权与数据安全则是核心争议点。

(二)数字主权:“日常数据”安全与政治争端“武器”

16世纪,传统主权理论自提出以来就与民主、法治和领土相连,国家主权被视为理解政治的核心概念。而随着信息产业发展,人们的视线开始转向“后主权”世界,国家不再是最重要和最终优越的权力来源。“数字主权”开始受到关注,认为国家或地区理应对其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部署具有自主权和决策权,涉及对特定领土数字权力的地理限制、国家确保数字基础设施的安全、公民在数字通信事务方面的权力等,催生新型地缘政治的诞生。

新型地缘政治强调数字空间权力对传统地缘政治权力的影响,是从网络物理空间层面看待数字主权动态博弈的过程。基础设施化平台在网络物理空间所建构的数字主权可分为基础设施层、逻辑层和数据层,国别地缘政治争端多肇始于此。^[25]基础设施层的主权指国家对领土内互联网技术架构最底层的、相对不可见的物质性通用介质的主权,这是一个由电缆、卫星、无线系统连接起来的物理传输网络,因其与国家领土密切联系,各国均普遍接受了这一界定。逻辑层的主权是国家对网络互联和传输的通信协议软件的主权,包括由通用接口、通用标准、通用数据组成的网络通用传输协议和域名系统(DNS)等,TikTok的在线流量就是通过TCP/IP等编码协议组织的,这类协议最初由美国政府工程师创制,美国在该领域展现出绝对优势,时至今日主导地位依旧显著。^[26]因此,新型地缘政治最大的矛盾就体现在数据层的主权争夺上。

随着主权国家试图对国际平台施加国家影响力,数字主权成为焦点议题。TikTok引发的新地缘政治冲突本质上是“数据主权”冲突,即强调对互联网的控制。数据层的主权是指对数据所有、存储和使用的权力,因数据主体和应用具有双重跨地性,数据主权的标准饱受争论。同时,相对于数字主权的基础设施层和逻辑层,美国在数据层并非主导地位,所以各国对TikTok的制裁也均源于此。Keohane等人将关涉国家权力的信息区分为“战略信息”和“非战略信息”,战略信息即关键武器计划的信息,是各国必须获取并保护的信息。^[27]跨国数字平台兴起使战略信息和非战略信息的区别越来越模糊。平台基础设施最核心的特征就是拥有大量用户贡献、非战略性的“日常数据”^[28],而这些数据一旦经过汇总、处理与分析,也可能变得具有战略意义,是一种“合成型战略信息”,从而影响国际地缘政治竞争。所以,成为各主权国家审查的主要目标。

不论是美国大选政治系统的运行,还是俄乌冲突中的信息与舆论战争,TikTok均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一些国家的立法者以安全审查为由,质疑其母公司能否充分保护用户数据安全以防止政府部门访问。以中美平台争端为例,2020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利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赋予的权力先后签署两份行政令对TikTok实施制裁。据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规定,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需要支持配合中国国家情报机关与国家安全工作。特朗普政府认为TikTok具备为中国政府提供出于情报目的访问用户数据的可能。为争取时间,字节跳动一方面向美国法院起诉特朗普政府,另一方面则与甲骨文、沃尔玛等美国企业积极谈判找寻符合两国法规的合作路径。

数字空间的地缘政治并非科技平台的斗争,民族国家始终是其背后决定性力量。2020年TikTok收购迫在眉睫之际,中国商务部和科技部紧急调整了《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增加了“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拜登政府时期尽管曾撤回了特朗普时期的禁令,却仍维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TikTok的安全审查,意味着基础更牢固的普遍管控。而面对数据安全的质疑,TikTok一直配合采取各项措施,包括雇佣当地1500名全职员工,并于2022年6月花费超过15亿美元将美国用户数据信息全面迁移到美国境内的甲骨文公司服务器上,与中国进行部分的身份切割,以应对美国监管机构对该应用数据完整性的担忧。^[29]但实际上,TikTok一直以来的数据管理做法与其他美国同行并无不同,甚至更为严苛谨慎,也没有迹象表明其会构成任何特定的国家安全威胁。

日常数据安全与数字主权被视作一种新型“武器”出现在日益频繁的地缘政治争端中。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2017年就投票废除了奥巴马时期的“网络中立”原则,互联网的政治倾向和文化规范特征日益显著,地缘政治内涵也成为全球数字政策的核心议题,遑论其在政治冲突中有被当作“武器”的趋势。^[30]领土和国家主权原则与全球数字网络的分散与灵活之间出现对立与分歧,在加剧恶化的数字地缘政治冲突下,数据主权逐渐丧失了其提出时促进网络信息安全流通、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理想愿景。

各国家与地区基于自治和自决针对关键数字基础设施安全的主张和措施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各方都担心在国家层面关注数字主权安全和互联网问题监管的努力会干扰互联网的开放性与普遍可访问性,并最终导致全球互联网“再局域化”。因为严格的数字地理隔阂一旦筑成,必然会对全球经济流动造成负面影响。

(三)新地缘政治:数字空间的新型地缘政治冲突

平台基础设施主导的新型地缘政治体现出传统地缘冲突的底色。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出海史冲击并挑战着美国平台的全球霸权。作为全球“平台政治”的两极,中美两国间的平台扩张与逆扩散自然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焦点。平台是数字社会的信息守门人,对全球政治、经济与文化系统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美国拥有全球主流平台的所有权与控制权,承担着全球数字基础设施的功能,享有巨大的权力辐射能力。TikTok之争是中美两国对数字空间主导权、控制权的争夺,是一场超越传统地理地缘政治的新型数字地缘政治冲突。

美国过去一直倡导“全球公域”式网络体系以促进自由经济,努力吸引中国投资者以扩大贸易。从尼克松到奥巴马等领导人均希望密集的经济关系使中国更紧密地与西方价值观相结合,尤其是与美国主导的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相结合。中国技术发展一直是美国情报工作与国家安全的核心关切。从“第一次CNN战争”到“第一次X战争”再到“第一次TikTok战争”,TikTok在全球信息流动中的地位及在美国大选中的角色使美国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加之俄乌冲突期间TikTok先后封禁了俄新社、RT等多家俄罗斯官方媒体账号,其在信息战和舆论战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TikTok以革命性的方式重塑信息传播、认知塑造与舆论争斗,其发展方向与中国式数字化进程并未符合西方的期待,其认为这反而可能带来一种政府参与式的新技术治理形式,揭示了中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导致美国平台监管的重心已从宽松的市场化转向更注重数据安全和平台抵御外部的能力。愈发集中化和板结化的全球平台生态系统为结构性和系统性地缘冲突的出现埋下了隐患,国际地缘政治向“两超多强”甚至“两极地缘格局”发展。

数据主权仍是这场地缘争端的“核心武器”。美国开始放弃过去以主权让渡换取经贸利益,转向以主权扩张限制经贸自由。^[31]美国对TikTok的责难充斥于近年的法案条文,2020年7月美国先后通过了《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TikTok应用法案》,并将“在政府设备中禁用TikTok”条款纳入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修正案。拜登政府时期的限制法案更具有针对性,2023年3月,众议院投票通过《威慑美国技术对手法案》,该法案允许财务部长以可能泄露数据为由封禁互联网平台。同期,美国参议院提出《限制危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威胁出现法案》,要求美国商务部部长调查来自中国等国的信息技术产品,美国总统有权要求对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产品下架,或要求相关公司拆分业务。^[32]尽管该提案并没有点名TikTok,但美国媒体评论均认为这是针对TikTok的提案。

这些法案为商务部对TikTok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和更详细的风险框架。早在2019年11月,CFIUS就启动了对字节跳动收购Musical.ly交易的审查,2019年和2020年美国国会针对TikTok事件已经召开过两次听证会,2023年3月是第三次听证会,也是TikTok首次派代表出席接受质询。听证会对TikTok的审查主要分为不良内容、数据安全与隐私安全三个方面,核心仍然是数据主权问题。但目前TikTok所有美国用户数据存储与安全防护不仅由美国公司甲骨文负责,甲骨文还验证了TikTok源代码,TikTok的数据保护和透明度远超所有同行。TikTok在听证会当天回

应称,强制出售并不会解决所谓的安全风险,更不会对数据流或访问带来改变。事实上,解决国家安全问题担忧的最佳方式是对美国用户数据和系统进行透明的、基于美国的保护,而 TikTok 已经在实施强大的第三方监测、审查和验证措施。^[33]

围绕 TikTok 展开的地缘政治冲突是全球企业、政府和民间关注的焦点话题。无独有偶,微信也卷入了中美之间日益加剧的贸易紧张局势和地缘政治竞争。这种依据国内法单方面制裁的主权扩张已成为数字地缘政治冲突中基于国别进行制裁的主要形式,并具有蔓延之势。

中美数字地缘政治冲突亦并非个案,2020年6月,印度信息技术部援引《信息技术法》并结合2009年信息技术规则禁止了包含 TikTok 在内的59款应用程序,认定中国平台从事“有损印度主权和完整性、印度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活动”,将公民的数据发送到位于印度境外的服务器,威胁印度数据主权。^[34]印度政府长期担心中国互联网平台主导当地市场,并警惕中国如何处理其收集的数据,因此一直避免签署数据共享协议。印度的被殖民历史让其一直对西方国家的威胁保持高度戒备,它将西方大型科技公司在印度的所作所为称为“数字殖民主义”。虽然印美可能会在对技术平台的态度上保持一致,但这种关系也很脆弱,美国平台 Meta 和 X 在印度遭遇的数据安全审查就证明了这一点。

传统地缘政治局限于主权国家领土地理范畴,互联网平台的崛起让全球数字空间呈现出“去领土化”的趋势,地缘政治冲突全面侵入数字空间,频频制造出地缘政治焦点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拜登在执政期间,均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行政、司法、意识形态等手段驱逐、封杀 TikTok,施压字节跳动放弃并出售 TikTok 所有权——即使 TikTok 遵照美国政府要求,将数据中心落地美国本土。这种以国家安全为由的数字审查,看似是国家间的“公私矛盾”,实则是中美国家间的“公公矛盾”,即大国地缘政治冲突在数字空间的延伸,呈现出一种“国家-国家”“国家-企业”“公权-私权”的复合嵌套形态。

五、平台地缘政治冲突:政治闯入、数字冷战与资本代理人

互联网平台的基础设施化使其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超国家权力,消解了原本属于主权国家的特定权力,威胁并挑战国家的主权安全。数字平台面临主权国家的竞争冲突,遭遇主权国家的“政治闯入”,陷入主权国家“政治代理人”的选择困境,成为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筹码与各方的争夺之物。而情感导向的民族主义进一步催化了这种情绪,成为在实理与情绪上难以调和的矛盾。

(一)数据民族主义:从“互联网”到“局域网”

新型地缘政治冲突与传统地缘问题本质上是相互交融与影响的。主权国家在保护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行业方面具有悠久历史,各国均越来越意识到其在基础设施控制问题上的脆弱性,“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与“数据民族主义(data nationalism)”的兴起对地缘政治矛盾与治理提出了新挑战。频繁的科技竞争见证了技术民族主义的新形态,并在一些国家转化为政策实践,即美国以文化对抗为前哨的保护主义政策。“技术民族主义”的回潮与“科技反冲”现象持续发展、科技的“泛安全化”倾向加剧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息息相关,并呈现出持续增强的态势。^[35]技术先发国利用政治手段干预并防范机会主义或敌对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者,获得竞争优势与地缘政治利益。

但随着大数据、云储存等技术发展,在传统技术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衍生出“数据民族主义”,即在新技术民族主义者看来,数据是国家资产,关涉国家核心安全,超级应用平台背后的数据所有权是问题的关键。数字平台与自由、开放和去中心化理想携手并至,却遭遇各种高墙与孤岛。从2020年白宫发布首个对外国平台的禁令,到印度禁止中国应用程序并考虑封锁谷歌和苹果应用程序商店,再到 Meta 警告欧洲其繁重的数据隐私规则可能会促使社交网络退出该地区的案例屡见不鲜。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表示,美国禁令或引发全球效仿,为各国网络空间保护主义开坏头,引发全球出台更多针对网络企业的禁令,危及全球互联网的未来。^[36]放眼世界,数据民族主义注定带来“科技

冷战”“数字霸权”的后冷战色彩,地球村只能是理想。

数据民族主义思潮反复涌现,破坏了技术全球主义的普惠硕果。TikTok 平台出海的意义已经不局限于全球经贸谈判,亦在于对跨文化信息流动秩序的挑战。其中数据的地方化存储与全球化流动之间的张力是矛盾的核心,随即产生诸多关于数据本地化的建议。数据主权早已上升到国家安全并扩展到更多领域,国家对数字基础设施控制的作用和能力不断增长。政策制定者试图将数据的存储、移动或处理限制在特定区域和管辖范围内,并且通常需要限制外国情报和商业机构对特定类型数据的访问权限。^[37]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全球“互联网”正在被逐渐分解成基于主权国家的“局域网”。

事实上,新型地缘政治促进抑或阻碍平台市场重组议程取决于国际合作的性质和态度。各国均在寻求全球数据自由流动与属地管理的平衡点;德国在其欧洲理事会主席国的官方计划中宣布“将数字主权确立为欧洲数字政策的主旨”;美国奉行网络空间属“全球公域”的原则,各国应减少对数据跨境流动的干预以促进自由度;欧盟则始终强调其有权接入数据的跨境流动并有责任对第三国的数据保护做出评估,坚持对数据的控制与监管,凸显出明确的属地主义立场;^[38]印度也在积极推动其本土技术议程;中国则明确了国家在监管与审查中的重要角色,从而保证平台生态系统的包容性未来。

(二)“政治闯入”: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安全

21 世纪之前,美国一直占据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近十多年,中国在科技与平台领域开始挑战美国的独家霸权。以华为、大疆为代表的新兴科技企业,在 5G 通信、新能源与无人机等领域,挑战并威胁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技术霸权。在平台领域,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平台巨头之外,美国应用商店下载排行榜前五名的热门平台 App 当中,有 4 个来自中国——拼多多旗下的 Temu,字节跳动旗下的 CapCut、TikTok 以及电商平台 Shein 等,形成中国平台对美国的“逆向扩散”。通过开发同一平台的两个版本,TikTok 成功地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平台生态系统中建立了自己的业务。它代表了“中国平台化”的进程——中国技术政治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平台逻辑渗透到全球社会。^[39]这种技术平台的“逆向扩散”渗透进美国的经济、民主与文化社会中,对美国的平台霸权形成威胁与挑战,引发美国的警惕与围堵。甚至 Zoom 作为纯粹美国本土企业,也因其创始人的华裔身份,被美国众议院前议长南希·佩洛西指责是“中国实体”,具有国家安全隐患。

数字平台、数字软件与数字基础设施已经超越了主权边界,挑战着主权国家的管辖权。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平台实际上已经具有“国家能力”的本质。强大的“数字非国家行为体”会成为真正的互联网国家,取得主权国家地位,乃至与传统国家分庭抗礼。^[40]平台的超国家权力让原本属于主权国家的部分权力流转到私营企业手上,在国际层面上解构了国家主权,整体上冲击了主权国家的权力。超级平台在技术能力、社会数据、社会动员与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已经掌握了超国家权力,具备准社会治理的能力。^[41]

尽管数字平台是超越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全球公共品,却被视为受制于主权国家管辖的“政治闯入”者,因为基础设施安全始终被视作国家安全领域的关键问题。新型地缘政治冲突在平台领域愈演愈烈,平台被迫卷入无法置身之外的数据主权与基础设施安全的国别纠纷,是超越民族国家的焦点,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与对抗的场域。主权国家正在交替审查或部署互联网平台,以维护国家数字主权与安全。^[42]

但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始终还是以民族国家当局为基础,并通过法治和私有财产制度不断塑造。因为如果没有国家基础,就不会有阿帕网或亚马逊,更不会有数字媒体的私有化或商业化。尽管信息与通信技术会带来导致行为主体身份和全球政治问题的深刻变革,但国家建设及其在国内和国外的权力投射项目,始终是全球化的基础^[43],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游戏仍会在包含现有国家在内的各种主体之间进行。就当下而言,主权国家依然凌驾于平台权力之上,在遭遇国家利益冲突时,平台必须配合隶属主权国家的利益诉求,成为主权国家权力的代理人。

平台话语的“无疆界”和“跨国性”并未削弱地缘政治的存在,反而引发了新地缘政治的多元冲突。在全球地缘政治的语境之内,平台尽管在诸多方面具备“国家能力”的本质,但依然无法摆脱以民族国家为主角的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呈现出国际间国家公权力与平台私权力的征用、合作与冲突。^[44]围绕 TikTok 的数字地缘政治争端,暴露出其依然被视为受制于主权国家管辖的“政治闯入”者角色,成为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筹码与各方的争夺之物。

(三) 数字冷战:政治代理人的阴霾

冲突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非战争性的对抗行为是当代国家关系的本质。随着中国数字平台的崛起,美国对中国发起多轮制裁,具有“数字冷战”的色彩。从美国对华为、中兴、大疆、TikTok 等一系列科技与平台企业发起的制裁来看,对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来说,其担忧源于一个简单的前提:中国政府可能会将该应用程序用作宣传工具或收集重要人物的信息,特别是政府和跨国公司中担任重要职位的人物,例如惧怕中国政府根据 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等法规介入 TikTok 的后台数据。在这背后,是美国对中国平台科技企业充当中国政府“政治代理人”的忧惧。

2018 年以来的中美对抗以及 2022 年俄乌冲突是沿着地缘政治路线重塑数字平台的高潮时刻,尤其乌克兰危机标志着平台政治化和武器化的转折点。^[43]俄乌冲突的后台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冲突。俄乌冲突已成为世界上一些最大科技公司的决定性地缘政治时刻,因为其数字平台已变成并成为信息战的主要战场,它们的数据和服务成为战争冲突中的重要工具。

Google、Meta、X 等公司被迫考虑如何运用这种权力,并夹在乌克兰、俄罗斯、欧盟和美国官员不断升级的对立要求之间。具体而言,Google 地图取消了乌克兰境内的实时交通信息,禁止俄罗斯用户访问实时交通信息,防止俄罗斯军队获取乌克兰人群聚集信息;X 给所有包含俄罗斯官方媒体链接的推文贴上标签;Meta 禁止俄罗斯支持的媒体;Telegram 创始人考虑屏蔽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一些与战争相关的频道。甚至作为第三方的中国华为、大疆等企业,也因担忧地缘政治冲突下美国“长臂管辖”的制裁行为,被迫切断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战争考验着地缘政治中平台的抉择,一旦发生冲突,美国的科技平台企业充当美国政府的代理人,让美国政府无需下场就可以对俄罗斯进行一系列技术制裁,这种行为必然会引发包括美国在内的主权国家的警惕。新一轮国际技术竞赛的主角看似是科技巨头,后台实则是主权国家的资本代理人。

类似的担忧也出现在海底电缆通信基础设施领域。与地缘政治化的石油行业一样,数字平台越来越“本地化”和“区域化”,因为大数据往往是不可移动的,细粒度、实时交易的本地性质受到空间集中的强制控制。美国对于中国企业所属 TikTok 的担忧与恐惧,根源于斯诺登事件暴露出美国对他国与盟友的监视。因此,当中国的华为海洋崛起为全球第四大海底电缆基础设施建造商时,美国亦担忧中国介入和监控全球通信基础设施。这种担忧的背后,则折射出美国菱镜计划监视惯例和脸书剑桥分析事件的阴霾,亦是帝国主义历史上“政治代理人”机制的映射,即充分调动逐利资本的创造和扩张动力,给予其特许公司性质的待遇,使之成为“帝国事业”充满野心的代理人,这是西方殖民力量从东印度公司时代开始就普遍采用的空间征服手段。^[45]

六、结语

中国本土平台技术与模式之所以能够全球,尤其美国本土“逆向扩散”,除了平台技术自主性之外,更得益于其在中国本土技术与商业模式的成功验证。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政府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对平台企业采取“包容性创新”的基本政策,大规模投资建设 4G/5G 通信基础设施,积极发展智能手机制造业,让数亿百姓用上平价智能手机,有了中国在全球移动互联网领域发展的长足基点,孵化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互联网平台。中美两大平台生态系统的竞争与博弈,看似是平台企业的技术商业竞争,实则是民族国家间的战略、技术、综合实力竞争与博弈。

平台化是一个类似于工业化或电气化的过程,企业和国家共同控制的平台生态系统似乎曾无限

接近了关于连接世界的普遍和中立的互联网的理想。但当这些基于技术平台的巨型基础设施逐渐接管城市、交通、通信和零售等全球信息和经济系统,取代了部分国家经济力量,甚至在规范民主和公民生活方面超越了民选政府和行政部门的政治影响力,开始挑战以国家为核心的公权力监管时,不得不引起各国政府重视。^[46]因为当一国基础设施性的公共产品依赖他国时,必然会激化不平等或受制情境,担忧自身数字主权与安全问题,进而使地缘政治渗透进平台领域。在主权国家的平台地缘政治冲突中,数据、算法与技术正成为数字化的战壕,而非互联网初期的乌托邦或伊甸园。

事与愿违的是,平台市场的发展逻辑越来越受到地方力量的影响,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对平台日常运营的强制性干预也日益增加。就像海权在19世纪获得商业主导地位、资本市场在20世纪成为金融主导一样,互联网技术平台有望在21世纪成为国家巩固政经实力的基础。^[47]各国在数字创新全球治理中的利益纠葛始终是地缘政治问题频发的持久驱动力,意识形态的惯有冲突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在数字空间。这表明各国数字平台并非作为不同生态系统独立运作,而是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权力、经济与技术交织。各国对平台数字基础设施与国际通信技术的控制,始终紧扣大国地缘政治较量。科技巨头们在全球市场与地方力量高度绑定的关系中,难掩对资源有限和萎缩的无力感。

TikTok面临的困境是新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中国平台全球化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缩影。围绕TikTok、华为引发的冲突与博弈,不仅仅在考验着中国,也在考验着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人类的治理智慧。TikTok、华为等企业面临的是不可消除的结构性困境,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在结构性冲突格局无法改变的宏观背景下,如何务实地解决中国数字企业面临的数字主权与新地缘政治冲突,核心的问题在于让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尽管这并不现实,但终归是一条有探索空间的道路。对字节跳动与TikTok来说,尽最大力量让TikTok回归商业逻辑,缓冲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国家竞争与地缘冲突元素,以谋取有限的发展空间。

零和博弈的观念只会增加全球结构性风险和集体脆弱性,冲突的反面亦存在广阔的合作可能。数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共同挑战是如何制定一项正式议程激励各国克服经济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动,实现数字经济中竞争、创新和权力下放的理想图景。面对超级平台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与数字主权安全,全球各主要主权国家应合力共谋,探索平等、共商、科学的治理方案,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超越分歧,打造具备全球化标准的技术体系、技术标准与技术应用以提升民众数字福祉,回归合作、共享、普惠的“技术合作主义”框架,在平台社会中保护共同公共利益,促进公平竞争和开放市场,通过数字平台全新合作网络的构建,提升网络空间的透明度、可信度和安全性。

参考文献:

- [1] J. C. Plantin, C. Lagoze, P. N. Edwards, et al. Infrastructure Studies Meet Platform Studies in the Age of Google and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 2018, 20(1): 293-310.
- [2] R. Andres. 地缘政治的基础已从工业力量转向信息控制. IPP 评论, 2021-03-25. [2022-10-01] <https://mp.weixin.qq.com/s/ib2pzuofq-fndxz3n2cd9w>.
- [3] 李坤泽, 张依桐. 美国的 TikTok 政策: 威胁认知、打压实践与效果制约. *国际关系研究*, 2024, 4: 22-40+155.
- [4] A. Helmond. The Platformization of the Web: Making Web Data Platform Ready. *Social Media+ Society*, 2015, 1(2): 1-11.
- [5] D. B. Nieborg, T. Poell. The Platform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Theorizing the Contingent Cultural Commodity. *New Media & Society*, 2018, 20(11): 4275-4292.
- [6] A. Ghazawneh, O. Henfridsson. Balancing Platform Control and External Contribution in Third-Party Development: The Boundary Resources Model.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2013, 23(2): 173-192.
- [7] T. Flew. Platforms on Trial. *Intermedia*, 2018, 46(2): 24-29.
- [8] J. Van Dijck, D. Nieborg, T. Poell. Reframing Platform Power. *Internet Policy Review*, 2019, 8(2): 1-18.
- [9] T. Gillespie.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s". *New Media & Society*, 2010, 12(3): 347-364.

- [10] J. C. Plantin, G. De Seta. Wechat as Infrastructure: The Techno-Nationalist Shaping of Chinese Digital Platform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9, 12(3): 257-273.
- [11] Z. Zhang. Infrastructuralization of Tik Tok: Transformation, Power Relationships, and Platformization of Video Entertainment in Chin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21, 43(2): 219-236.
- [12] D. B. V. Kaye, X. Chen, J. Zeng. The Co-Evolution of Two Chinese Mobile Short Video Apps: Parallel Platformization of Douyin and TikTok.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2021, 9(2): 229-253.
- [13] 姬德强, 张毓强. 谁的 TikTok: 国际传播视野中的数字平台. *对外传播*, 2024, 4: 68-72.
- [14] K. Rider, D. M. Wood. Condemned to Connection? Network Communitarianism in Mark Zuckerberg's "Facebook Manifesto". *New Media & Society*, 2019, 21(3): 639-654.
- [15] M. F. Vila Seoane. Alibaba's Discourse for the Digital Silk Road: The 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 and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0, 13(1): 68-83.
- [16] S. Frenkel, N. Casey, P. Mozur. In Some Countries, Facebook's Fiddling Has Magnified Fake News. *New York Times*, 2018; 14.
- [17]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竞赛方案: 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 刘晓明, 陈京华, 赵滨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8: 6.
- [18] 蔡翠红. 网络地缘政治: 中美关系分析的新视角. *国际政治研究*, 2018, 1: 9-37+5.
- [19] 闻宇, 朱春阳. 跨国企业如何通过沟通消解外来者劣势? ——对美国封禁 TikTok 事件的历时分析(2019—2024). *未来传播*, 2024, 4: 63-73.
- [20] 李呈野, 任孟山. 跨文化传播视阈下 TikTok 的东南亚“在地化”路径. *传媒*, 2020, 18: 53-56.
- [21] S. Graham, S. Marvin. *Splintering Urbanism: Networked Infrastructures, Technological Mobilities and the Urban Con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92.
- [22] J. Van Dijck, T. Poell, M. De Waal.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13.
- [23] TikTok 全球用户数量突破 20 亿. 搜狐新闻, 2024-06-04. [2024-10-04] https://www.sohu.com/a/783584627_121334945.
- [24] 段世昌. 从“寄生”到“共栖”——淘宝平台如何走向基础设施化. *新闻记者*, 2021, 7: 86-96.
- [25] 冯硕. TikTok 被禁中的数据博弈与法律回应. *东方法学*, 2021, 1: 74-89.
- [26] 刘晗, 叶开儒. 网络主权的分层法律形态.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0, 4: 67-82.
- [27] R. O. Keohane, J.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1998, 77(5), 81-94.
- [28] H. Shen, Y. He. The Geopolitics of Infrastructuralized Platforms: the Case of Alibab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22, 25(16): 2363-2380.
- [29] TikTok 美国用户数据转移至甲骨文: 新团队监管, 字节无法访问. 凤凰网, 2022-06-18. [2022-10-10] <https://tech.ifeng.com/c/8GwTNTThd5Zu#>.
- [30] 姬德强. 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 中国网络媒体全球传播的新语境与新路径. *对外传播*, 2020, 11: 14-16.
- [31] J. E. Alvarez. The Return of the State. *Minneso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 Minn, 2011, 20: 223-264.
- [32] J. Sherman. Two New Bills on TikTok and Beyond: The Data Act and Restrict Act. *Lawfare*, 2023-03-23. [2023-04-01] <https://www.lawfareblog.com/two-new-bills-tiktok-and-beyond-data-act-and-restrict-act>.
- [33] 范佳来. TikTok Ceo 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 封禁不是唯一选择. 澎湃新闻新闻, 2023-03-24. [2023-04-01]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420696.
- [34] Ministry of Electronics & IT. Government Bans 59 Mobile Apps Which Are Prejudicial to Sovereignty and Integrity of India, Defence of India, Security of State and Public Order.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Government of India, 2020-06-29. [2023-04-30] <https://pib.gov.in/PressReleaseDetailm.aspx?PRID=1635206>.
- [35] 李峥. 全球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及其影响. *现代国际关系*, 2021, 3: 31-39+64.
- [36] 李艳, 周宁南. 项庄舞剑欲何为? ——TikTok 事件的棱镜效应.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2023-03-25. [2023-04-01] https://mp.weixin.qq.com/s/kdalya0gvwrpilhctqh_w.
- [37] J. Pohle, T. Thiel. Digital Sovereignty. *Internet Policy Review*, 2020, 9(4): 1-19.

- [38] 张继红. 个人数据跨境传输限制及其解决方案. 东方法学, 2018, 6: 37-48.
- [39] J. Lin. One App, Two Versions: TikTok and the Platformization From China. *Aoir Selected Papers of Internet Research*, 2020. [2025-02-02] <https://doi.org/10.5210/spir.v2020i0.11260>.
- [40] 徐德驩, 姚建华. 脸书是一个国家吗? ——“Facebookistan”与社交媒体的国家化想象. 新闻记者, 2018, 11: 15-25.
- [41] 刘战伟. 凸显什么? 遮蔽什么? ——作为隐喻的“平台”: 连接、中介与基础设施. 新闻记者, 2022, 6: 54-66.
- [42] J. De Kloet, T. Poell, Z. Guohua, et al. “The Platform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nfrastructure, Governance, and Practic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9, 12(3): 249-256.
- [43] J. L. Qiu. Three Approaches to Platform Studies: Cobweb, Billiard Balls, and Ant Societies. *Social Media+ Society*, 2023, 9(3): 1-13.
- [44] 刘战伟, 刘洁. “平台/Platform”: 一个概念史的溯源性研究. 新闻与写作, 2023, 8: 70-82.
- [45] 王维佳, 张涵抒. 超越地缘? 全球卫星网络的创造与失败. 全球传媒学刊, 2022, 6: 3-20.
- [46] R. Beigel. Democracy Hacked: Political Turmoil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in the Digital Age. *Journal of Cyber Policy*, 2019, 4(2): 302-303.
- [47] Baron. Tech Platforms: The New Battleground in the U. S. -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2019. [2023-04-01] <https://baronpa.com/library/tech-platforms-the-new-battleground-in-the-u-s-china-strategic-competition>.

Platform Infrastructure, Digital Sovereignty, and New Geopolitics: A Study Based on Douyin and TikTok

Liu Ji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Liu Zhanwei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net platforms' infrastructuralization makes digital platforms become global public goods and public utilities that transcend national territory and sovereignty, but it is difficult to avoid national disputes in data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leading to new geopolitical conflict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parallel platforms of Douyin and TikTok, this paper focuses on major global digital platform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regions such a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nalyzes three major themes of parallel platformization and infrastructuralization, digital sovereignty and daily data security, and new geopolitical conflicts in cyberspace triggered by platforms.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reverse diffusion of Chinese digital platforms has sparked fears among other sovereign countries that platforms are becoming “political agents”. Although the platform has supranational power to some extent, it still assumes the role of “political intrusion”,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sovereign states, and becomes a c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al game and a thing contested by all parties. Therefore, the nation-state remains a central player in global competition and dominates the order of platform politics.

Key words: internet platforms; geopolitics; infrastructure; digital sovereignty; platform politics

■ 收稿日期: 2023-07-24

■ 作者单位: 刘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北京 100873

刘战伟,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1

■ 责任编辑: 汪晓清